

註釋

- ① Robert Brenner,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no. 104 (July/August 1977): 27-92.
- ②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③ Robert Brenner and Christopher Isett, "England's Divergence from China's Yangzi Delta: Property Relations, Microeconomics, and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 no. 2 (May 2002): 609-62.

趙永佳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研究領域為東亞發展、社會運動和發展社會學。主要著述有*The Politics of Laissez-faire: Hong Kong's Strategy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994)，合著有*East Asia and the World Economy* (1995)。

代謝的裂隙：東方和西方？

——從西方的興起到東亞的復興的社會生態危機

● 穆 爾

(Jason W. Moore)

《東亞的復興》旨在解釋這個「世界區域」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重新高漲的經濟活力。我採用「代謝的裂隙」這個概念是指，在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營養迴圈中出現了多層次的裂隙。從這個觀點來看，資本主義是社會生態關係的獨特的具體體現。儘管代謝的裂隙是所有文明的共同特徵，但它在近代世界卻表現得極為突出。

在《東亞的復興》中的論文，旨在解釋這個「世界區域」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重新高漲的經濟活力。在這裏，我想集中討論〈資本主義的歷史：東方和西方〉一文，因為在我看來，這是本書的核心論文。

我認為，儘管這篇文章雄心勃勃，想要說明和解釋過去五百年間的東西分合模式，但它卻受到歷史資本主義概念的限制，而這一概念將社會生態關係外在化了。有鑑於此，這裏所爭論就不是觀察視角合適與否的問題，而是觀察視角本身的性質問題。由於歷史資本主義概念主要局限於競爭、衝突和革新的某些社會環節，因此，我建議用另外一種分析視角來取代它。我認為，我們必須透過現代性的主要交替和演化模式來認識生態過程與社會過程之間的盤根錯節的關係。這些模式包括國家的形成、國與國之間的競爭、社會革命、殖民擴張，甚至還包括金融化！我採用了「代謝的裂隙」(metabolic rift) 這一概念作為我的討論的出發點。這個概念是指，在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營養迴圈(nutrient cycling)中出現了多層次的裂隙。儘管代謝的裂隙是所有文明的共同特徵，但它在近代世界卻表現得極為突出。從這個觀點來看，資本主義與其說是存在於一個物理環境中的社會系統，還不如說是社會生態關係的獨特的具體體現。

沃勒斯坦對「歷史資本主義」的表述已引起了廣泛關注。不過，對阿里吉等人來說，「歷史資本主義」卻具有與沃勒斯坦的表述很不相同的含義。雖然兩種闡述都強調了無限積累的重要性，認為這種積累是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但阿里吉等人強調了一種更狹窄的概念框架。沃勒斯坦認為，歷史資本主義的關鍵就在於土地和勞動的無情商品化。從這種廣泛的意義上說，它是一種生產方式。相反，對阿里吉來說，資本主義首先是一種積累方式，理由如下：第一，按照這一概念，居於優先地位的是系統仲介（國家和企業）的創新，而不是反系統仲介的創新；第二，這一概念假定，社會生態變化與資本積累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矛盾。資本之所以能夠帶來高額利潤，是因為它具有「無限的靈活性和變化適應的能力」^①。這種靈活性使資本的無限積累成為可能，構成了資本的基本社會特徵。土地和勞動的商品化與資本的自我擴張有某種牽連，但並不辯證地受制於它。這種在布勞代爾啟發下發展起來的歷史社會學使生態生產和特性與資本積累脫離了關係，在市場和物質生活的層面上肯定了自然與社會的辯證法，但又在資本主義的層面上否定了它。

〈資本主義的歷史〉的幾位作者指出了由此而產生的幾個後果。其中的一個後果是，中世紀中國的農業生態革命——以高產多熟水稻為中心——成為這個時期的擴張、尤其是東南部「商業革命」的主要因素。不過，隨後出現的「資本主義轉型」的「主要趨勢」並不與提供了許多可能性的農業生態變革相聯繫。農業生態革命發生了，但在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後便銷聲匿迹了。

不過，對過去五百年間中國社會生態關係的這種「大爆炸式」處理也許並不怎麼富有成效。到了中世紀，中國已成為地球上最「徹底的人造」地貌的大本營^②。而且，這不光是一個程度的問題，生態變革的形式也很重要。尤其重要的是，中國中世紀的水稻革命也許強化了這樣一種趨勢，即：帝國採納了我所謂的內部生態修補機制（internal ecological fix）。

為甚麼會是這樣呢？這個問題涉及到中世紀中國水稻的政治生態。誠然，所有的前現代文明在某種程度上都是靠國家才得以維持的，因為國家整治和改造了它們的物理環境，但在中國，國家發揮了更積極的作用，其程度之高、規模之大、時間之長久，超過了任何其他國家。與小麥——一種「吞噬土地、令土地定期休耕的」農作物——不同，這種新的水稻種植不僅產量更大，而且更具可持續性。既然如此，問題又出在甚麼地方呢？在獲得更高的生產率並針對每年的雨水變化採取一定的保險措施的同時，中國也付出了伊懋可（Mark Elvin）所說的「前現代技術『鎖閉』」的代價^③。若要讓這一系統發揮作用，就需要適當地整治河流生態、水壩、灌溉渠道和運河系統，這種狀況促進了皇權的擴大。「為了防止劇烈的生態惡化，就必須經常不斷地採取集中維護的措施」，世界上還沒有有其他文明陷入了這樣一種狀態^④。與中世紀的歐洲不同，這種情形有利於形成一種應對危機的獨特方法：中國統治階層可以利用國家來重新裝備生態基礎設施，從而解決遍及整個體系的農業萎縮問題。

這與水稻（相對於小麥而言）的政治生態是如何聯繫在一起的呢？小麥是「思想獨立的農業社會」的基礎。無論在亞洲，還是在歐洲，這些農業社會都不斷地

幾位作者指出中世紀中國以高產多熟水稻為中心的農業生態革命，也許強化了帝國內部的生態修補機制。因為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國家發揮了積極作用，也付出了伊懋可所說的「前現代技術『鎖閉』」的代價。水稻種植將「種植者的技術」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將勞力輸入最大化，從而「嚴重阻礙了」類似於西北歐那樣的農業革命。

阻撓了領土的合併。相反，水稻不能離開水利基礎設施，這樣就使王國的創立者掌握了「一個致命的武器，即大面積的饑餓」。但與此同時，要建造和維護這種水利基礎設施，就需要人們作出巨大的「集體努力」。這有助於加強各鄉村的力量，迫使國家照顧它們的福利。領土形成過程中的不同趨勢配合着生產點上的差異。水稻似乎有利於形成大規模的領土權力，但卻削弱了土地所有者接手生產的可能性。相對於小麥而言，依賴於土地灌溉的水稻種植將「種植者的技術」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而不太重視「愈來愈複雜的生產工具」。水稻種植將勞力輸入最大化，從而「嚴重阻礙了」類似於西北歐那樣的農業革命^⑤。

對社會化約論者的歷史資本主義以及東西不同發展軌迹的觀念而言，這種農藝上的差別究竟提示了一些甚麼呢？首先，這些文明的政治生態決定了人們對漫長的十四世紀遍及整個非洲和歐亞大陸的農業萎縮的獨特的、具有重要意義的回應。儘管中國和歐洲都經歷了人口的銳減、農民的騷亂和政治危機，但衰退的社會生態特徵以及隨後採取的克服衰退的辦法卻大相逕庭。

在歐洲，漫長的十四世紀始於農業的萎縮，而這種萎縮很快轉化成一場危機。阿里吉等人正確地看到了這個時代國與國之間不斷升級的衝突，並且令人信服地指出，這種衝突伴隨着對流動資本的與日俱增的需求以及相應的全球擴張的壓力。然而，這種領土性的權力—資本積累的辯證法只是遍及整個系統、範圍更大的危機的一個要素。到了1300年，農業收成及相應的領主收入已經開始銳減。國家打仗，爭奪流動資本，恰恰因為農業危機限制了國家從內部獲取收入的能力。國家無法利用內部生態修補機制來解決問題。

歐洲正在出現的危機開啟了一種基於土地延伸而非勞動集約的文明政治生態，這種政治生態不適合於集權的修補辦法。在中世紀，小麥以及與之相伴隨的牲畜吞噬了土壤。經過一段時間，土壤漸漸被消耗淨盡了，新的定居點也未能彌補由此而造成的虧缺。正當封建農業加強了農民力量的時候，這種農業的基本階級關係——而非馬爾薩斯式的矛盾——卻削弱了農業的生態基礎。封建制度用政治手段獲取剩餘價值，但也承認農民一直享有的各種權利。在這種情況下，它就既不能採取必要的強制手段，也不能提供必要的刺激以確保生產力的不斷提高。不僅如此，生產力的提高還常常因為封建苛捐雜稅而受到阻礙。促進農業發展各種舉措也達到了領主霸權所能允許的上限。在封建制度的「簡單再生產的擠壓」^⑥下，農民被迫以毀損土壤的方式進行耕作以謀取生存；沒有人強迫他減少土壤消耗，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產率。結果就出現了這樣一個社會生態系統：在人口增長的壓力下，封建主與農民的關係促成了從牧場向耕地的長遠轉移。這樣就減少了補充土壤肥力所需的牲畜數量，從而需要開展新的殖民活動，新一輪的生態透支又開始了。這確實是一個惡性循環！

所有這一切都為1300年後的大規模饑荒做好了鋪墊。大饑荒造成人口的大量流失，再加上黑死病(1347-51)引發的周期性流行病震盪，恰好擊中了封建階級權力的要害，即勞動與土地的較高比率(這種比率強化了系統的勞動密集型強制積累策略)。由於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勞動與土地的比率大大下降了，有力地消除了封建制度的勞動後備大軍的功能對等物。農民討價還價的能力——尤

儘管在十四世紀中國和歐洲都經歷了人口銳減、農民騷亂和政治危機，但衰退的社會生態特徵以及隨後採取的克服衰退的辦法卻大相逕庭。歐洲在1300年後的大規模饑荒造成人口大量流失，再加上黑死病引發的周期性流行病震盪，導致了從蕭條向危機的轉化。由於歐洲統治階層不能靠內部修補機制解決問題，因此，它們就只能利用外部生態修補機制——即海外擴張——來彌補其損失。

其在歐洲——也相應提高了，從而加劇了領主收入的持續萎縮。不僅如此，封建制度此前已經捲入到國家建構和商業化的浪潮中，這樣就在農民中間形成了新的團結紐帶，共同抵制這一浪潮。農民的力量愈來愈強大，對歐洲各統治階層來說，這種情形導致了從蕭條向危機的轉化。當然，這些統治階層也採取了種種強制措施以恢復封建秩序，但所有這一切都沒有甚麼效果。由於歐洲統治階層——國家、領主、商人——不能靠內部修補機制解決問題，因此，它們就只能利用外部生態修補機制——即海外擴張——來彌補其損失。

大約與歐洲同時，中國也開展了一系列海上探險活動。歐洲走上了一條征服全球的道路，而中國則沒有，這與中世紀社會生態危機的不均衡有一定的關係。歐洲的危機是系統的危機，而中國的危機則是系統內部的危機。在一個世界區域裏，靠貢賦運轉的統治機器即將出現裂隙直至灰飛煙滅，而在另外一個世界區域，同樣的統治機器仍將完好無損地延續幾個世紀。中國——由於她具備世界上「最強大的生態互補性」^⑦——一方面不像中世紀歐洲那樣動不動就陷入危機，另一方面又比中世紀歐洲更適合於內部修補機制。在漫長的十四世紀，儘管發生了農民騷動和政治危機，但中國卻能夠「恢復農業」，並在農業稅收——而非商業稅收——的基礎上恢復「最基本的那一部分國家資源」^⑧。

這恰恰是中世紀晚期的歐洲所無法做到的。農業關係很難自上而下地、朝着有利於恢復封建秩序的方向予以重組，相反，依靠海外擴張，則有可能增加經濟剩餘價值，從而在避開難以駕馭的農民的情況下消除封建制度危機的核心元素。然而，光靠掠奪和商業再分配並不足以增加剩餘價值，現在必須用社會生態轉型來取代再分配。

不妨走進商品領域來看看吧。長期以來，非洲和歐亞大陸的文明國家對形形色色的區域性社會生態危機產生了影響。為了緩解危機，這些國家採取了某種以資源領域為核心的擴張政策。不過，到了十五世紀中葉，由於歐洲各主要階層面對着強大的農民階層和混亂的社會生態秩序，因此，它們就開始實行一種新的文明策略。商品生產和交換（這是文明擴張的突出特徵）迅速變成了目的本身，商品領域日益取代了資源領域。中世紀的擴張基本上具有再分配的意義，而新的商品領域則具有深刻的變革力量。商人的利潤和國家領主的收入首先是通過糖料作物種植園和銀礦開採中心而在一個新的世界歷史基礎上重新確立起來。這個新的基礎就是：土地和勞動的永無休止的商業化。

資本主義的興起標誌着生態惡化的規模、範圍和速度的大飛躍。城鎮和鄉村之間古老對立上升為全球化生態征服和危機的辯證法。這種「代謝的裂隙」既體現了社會生態關係的新網絡，同時又使之成為可能。通過這種代謝裂隙，生態財富以一種日益不可持續的方式從鄉村轉移到城市。全球擴張、而非區域領土的擴大成為解決社會生態問題的最佳辦法。於是，就出現了現代所特有的「連續過度開採」模式^⑨：一個接着一個的地區出現了社會生態資源相對耗盡的狀況，隨後是以獲取新的勞動和土地供給為目的的地理擴張的周期性浪潮，由此形成了不可持續發展的新的、範圍廣泛的迴圈。生態危機的全球化第一次鑲刻在文明的運動規律上。

大約與歐洲同時，中國也開展了一系列海上探險活動。歐洲走上了一條征服全球的道路，而中國則沒有。中國由於具備世界上「最強大的生態互補性」，一方面不像中世紀歐洲那樣動不動就陷入危機，另一方面有比中世紀歐洲更適合於內部修補的機制，因而克服了十四世紀的農民騷動和政治危機，恢復最基本的國家資源。

阿里吉等人採取了一種強調社會影響產生環境結果的研究方法，傾向於將人類本性和人類之外的自然歸結為原料，其唯一的、真正的力量在於自然極限的窮盡。從「代謝的裂隙」這一概念出發，我們可以將生態矛盾置於資本主義更廣闊的空間和生產關係中來看待。環境的各種變化就不只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後果了，它們同樣也促進了這一發展。

我們如何讓自然的生產成為大規模的比較研究的一個課題呢？這是以世界歷史為出發點的研究所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之一。對阿里吉等人來說，生態因素是存在的，但僅僅存在於邊緣。他們正確地認為，對「自然資源和能源」的控制值得重視，有必要將這種控制與對「財政資源」的控制放在一起加以考慮。不過，對幾位作者來說，真正要緊的是後者的社會關係，其作用方式不依賴於前者。這樣一來，他們就有效地將積累的這兩個環節集裝箱化了，複製出一個不恰當地將「社會」對「環境」的影響置於優先地位的歷史概念，從而表現出一個更普遍的傾向。也就是說，他們採取了一種強調社會影響產生環境結果的研究方法。這一研究方法認定自然與社會具有內在的同質性，並且在本體論上先於社會生態總體。於是，它就傾向於將人類本性和人類之外的自然歸結為原料，其唯一的、真正的力量在於自然極限的窮盡。

另外一種構想——我稱之為辯證反饋的觀點——拒絕接受自然與社會的這種二元論。「代謝的裂隙」同時體現了生態和社會關係，從這一概念出發，我們可以將生態矛盾置於資本主義更廣闊的空間和生產關係中來看待。從這一視點來看，城鄉對立就變成了現代世界的一種持久的社會生態關係，其矛盾展現了生態財富從鄉村向城市的不可持續的轉移。於是，環境的各種變化就不只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後果了，它們同樣也促進了這一發展，既是結果，又是條件。這一現代對立是十分獨特的。它表明，東亞在復興過程中還要克服重重困難；與此同時，它也提示我們，人類的未來之路不會是一條坦途。

註釋

① Fernand Braudel, *The Wheels of Commerce*, trans. Sian Reynold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2), 433.

②④⑦ J. R. McNeill, "Chin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World Perspective", in *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 ed. Mark Elvin and Liu Ts'ui-j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7; 37; 34-35.

③ Mark Elvin,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nsustainable Growth: China's Environment from Archaic Times to the Present", *East Asian History*, no. 6 (1993): 12.

⑤ Ravi Arvind Palat,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s in Agrarian Systems Based on Wet-Rice Cultivation: Toward an Alternative Model of Social Change", in *Food and Agrarian Orders in the World-Economy*, ed. Philip D. McMichael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5), 56-57, 70.

⑥ Michael Watts, *Silent Violence: Food, Famine, and Peasantry in Northern Niger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34-35.

⑧ Jacques Gernet,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390-91.

⑨ Madhav Gadgil and Ramachandra Guha, *This Fissured Land: 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Ind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穆爾 (Jason W. Moore)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地理系博士候選人。研究領域為世界體系發展與生態危機的關係。